

一锅一碗思华年



叶嘉莹先生

叶嘉莹
(1924年7月-2024年11月)

出生于北京,号迦陵,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教育家、诗人,生前任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,南开大学讲席教授,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,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》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《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》《迦陵论词丛稿》《迦陵论诗丛稿》等。

又一个春天来了。即使在北京,这些天樱花、桃花和海棠也都开了。看着绽放的海棠花,我不得由想起去年秋天,迦陵先生说,秋天了,叶子落了,我恐怕看不到明年的春暖花开了。想到这些,我不得由潸然泪下。

1991年秋,我因为偶然的机缘,拜识先生(详见2023年11月6日《人民政协报》拙文《初见》)。

认识之后,因为要修改文章,要向她请教,去她住处拜访的次数就多了。那时先生住南开大学专家楼一层最东头儿的那间,我一直记得是110房间,去年11月底,我又去看,却是106。今天我查先生当年给我的信,有文字记录,记的是她最初住103,后来的确住的是106。

这103和106,当年就是我的一个精神港湾。

当年的叶先生,才刚刚67岁。今天看来,正是她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。这时的叶先生,既不像她90多岁以后,年高体弱,也不像她六七十年的照片中那样,比较文弱、文静,目光中时有忧郁;1991年的迦陵先生,精神健旺、精力充沛,身形匀称、步履矫健,一头浓密乌黑的秀发,谈话时总是满面笑容。记得第二次到103拜访她,说话间她到厨房去了一趟,再回来,她就站在客厅房间门口,说着说着,就势倚着门框,接着聊天。我本来是坐在较低的沙发上,这时要站起来,她摆摆手说:你就坐着好了,不用客气;我成天坐着,站一站舒服。——她就这样微微倚着门框,很自然放松,站着和我说话,聊了很长时间。说这是我的精神港湾,是因为这里是完全不同于我原来生活的另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的主人和我聊的,大多是我很陌生的另一个时空里的事情,听听,温哥华、剑桥,还有台湾新竹,这些地名离我该是多么遥远啊,简直远在天边。虽然也聊文章诗词,但也和我已经习惯的话语不是一个系统,不是一个频道。主人的言谈举止如此优雅,和我原来认识的人也都不一样,还有她说话,总有旧时的词语,再配上一口清脆悦耳的地道京腔儿,甚至她随手写信、写便条,都是繁体字,而她的身份分明又是个外国教授。这真是不可思议。这是一种完全在精神气质上的不一样,是从内在思想到外在形象的不一样,如同天外来客。——总之,我无法形容这种感觉。

在专家楼叶先生那里,我最早见到从台湾来看叶先生的施淑教授,也是她上世纪60年代的老学生,著名作家施淑青和李昂的大姐。叶先生和她的老学生们之间,那种互相尊重、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,真是令人羡慕,特别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大陆的老教师们,有过与此截然相反的遭遇后,对此感觉会更加强烈吧。另外,平时只能在书中看到名字的名学者,在专家楼叶先生那里,见到的何止一二人。——不夸张地说,迦陵先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。因为家严家慈也都是老师,而且是中文系毕业的,他们的同事中,也有叶先生一位最要好的辅仁大学女同学的女儿,这样先生和我就多了一层共同话题。

就这样,自然而然,和先生熟了。有时下午聊到五点多六点钟,先生就留我在她那里吃饭。第一次,我真是不好意思,毕竟不熟,或去或留,都怕唐突。留下来吧,显然给老先生添麻烦;不留下呢,又怕不礼貌,拂了主人的好意。我相信,刚开始,叶先生也是有客气的成分。但即使是客气,也是那样一种自然的礼貌,一种让一个晚辈、一个客人感觉到自然、亲切,同时又是受到尊重的客气礼貌。后来我看一些南开校友回忆与叶先生的交往,才知道,叶先生请学生帮忙、跑腿之后,通常是会请学生吃一次饭表示感谢的。其实,这也是老辈人、老北京人待客的常礼,并非对我的特殊待遇。但我那时并不太懂,所以刚开始,不免拘谨。但再拘谨,也是第一次第二次拘谨,第三次第四次,也就不那么拘谨了。

吃的都很简单,往往都是上一顿饭从餐厅买的饭没有吃完的,再放在锅里,在火上热一热,或者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。有时临时觉得不够,她就从冰箱再拿点儿东西,或者叫我去专家楼餐厅再去买点儿。先生并不刻意,就是有什么吃什么。有时



作者与严文明先生(左)合影

严文明

(1932年10月-2024年4月)

出生于湖南华容,著名考古学家,生前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、考古学理论与方法,中国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仰韶文化研究》《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》《史前考古论集》《农业发生和文明起源》等。

早知道敬爱的严文明先生是考古界的诗人,也曾零星读过先生的诗作,近日捧读先生的诗集《浚哲诗稿》,才得窥先生诗作的全貌。先生的诗多及于学问,故由诗而入学问,也不啻为一个极佳的学史体会和观察角度。读诗的过程中,与先生交往,受先生恩惠的一幕幕,都渐次浮现于眼前。

最先注意到且感意外的,是在先生全部48首诗稿中,缅怀考古界同仁的只有两首,而且都是写给恩师徐苹芳先生的。其中第一首《悼徐苹芳》,写于2011年5月30日:

力耕汉唐 学领风骚 城市考古 尤多捉刀
刚毅正直 人人称道 斯人虽去 大树不倒
短短几句,徐苹芳先生为人为学的业绩风格、风骨和坚持,跃然纸上。徐苹芳先生辞世之际,媒体报道所言“敢于直言的‘考古界良心’走了”,可以作为严文明先生“刚毅正直,人人称道”这一断语的注脚。

这部《浚哲诗稿》是2019年12月出版的。诗集的封笔之作《忆徐苹芳》写于当年的5月30日:

力耕汉唐 唐金元,城市考古 著先鞭。都城发掘树样板,明清城下过金元。
学领风骚不自满,刚毅正直敢为先。斯人离去长相思,好友无时梦魂牵!

如果《悼徐苹芳》像一副挽联,那么七言律诗《忆徐苹芳》显然是前者的扩展。《浚哲诗稿》是严先生自己整理的,他没有在这篇下加注,展开说明为何时隔8年,他又在当年“悼”老友的基础上,开始“忆”老友。“力耕汉唐”“城市考古”都见于前诗,而“著先鞭”“树样板”“不自满”“敢为先”,则对徐苹芳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品德作进一步的褒扬阐发。

有学者对清末民初以来学人的代际变迁作了划分,其中“第三代人,1930年前后生人,……他们多半在前一时代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,多半没有留学机会,学术训练与

饺子,有时面条,有时馒头,再配一两个菜,她再熬点儿粥。熬粥是用一个淡黄色的小铝锅,另外有两个小碗和两个小碟子。还有一个稍大一些的瓷碗,有时候也当菜碗,用来盛菜。总之都是家常饭菜。

1992年暑假过后,叶先生要回北美,先是要应孙康宜教授邀请去耶鲁大学讲辛弃疾词,然后再回温哥华。临行前几天,我到专家楼去看她。叶先生收拾着东西,对我说,她从去年回国后用的这些个碗筷餐具,或者还给餐厅,或者另外处理。只是这只小铝锅和这只瓷碗,是她自己从温哥华带来的个人物品,她不用还给餐厅,也不想再带回温哥华去,因为行李实在太多。同时她又不舍得扔掉,反正也是用很多年,是旧物。她就问,晓风,这个锅和这只碗,你如果需要的话,送给你用怎么样,反正也是咱俩这些个日子一起吃饭用的。

——这就是这一锅一碗的来历。

我当时住南开研究生楼17楼。当年的学生,家境都一般,贫寒子弟也不少,食堂好点儿的饭菜舍不得买;大家又都是20岁上下的精壮小青年,所以普遍吃不饱。而高校里的食堂,晚饭开饭时间普遍太早,都是下午五点还不到就开饭。我们到了晚上九点来钟,就开始有饥饿感,有时晚上饿得睡不着觉。于是,晚上加餐就很普遍。所谓加餐,不过就是在宿舍里偷偷用电炉子煮包方便面而已。当年天南大等高校附近,卖电炉子的因此很挣钱。以前我用自己的饭盒煮方便面,总是不得劲。先生送我的这个小锅正当用,而且又很实用,主要是大小合适。这个锅外形小巧,盖上一个盖儿,看上去圆圆的,很可爱。但它容量其实不小,锅口直径16厘米,算上两边的把手总宽21厘米半,锅深7.5厘米,刚好可以放两小包方便面,还能加一根小火腿肠,有时看书到深夜,需要再打个鸡蛋,也能行。碗也挺漂亮。直径比我原来在家用的碗稍大,但扁平一些,有一指宽的碗沿儿,沿儿上釉着一粗一细两圈儿藏青色的花边儿,碗体却是淡淡的蛋青色,两种颜色搭配起来,朴素淡雅。碗底有几行英文,最后一行是MADE IN CHINA(中国制造),可见是国内出口的,被先生买到。这一锅一碗,在那几年,我不知用它们吃了多少包方便面。

这一锅一碗,后来又从天津跟我来到北京,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搬家,我一直不敢丢,已经33年了。小锅因为是铝制的,不十分坚硬,有两处凹痕,锅底的漆早已磨光。因为现在做饭都用大锅了,所以这个小锅平常放在柜子深处,很少用。瓷碗最外一圈儿的蓝釉细线有点儿磨损,现在我还经常用它盛粥喝。

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,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才的能力,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时代境遇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”(叶隼:《民国学术丛刊总序》)。显然,徐苹芳先生和严文明先生都位列其中,而且属于前述“部分学者”,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完全可以理解。

我们这代考古学人,都是读着严文明先生的论著长大的。我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徐苹芳先生做城市考古,因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先秦、秦汉考古的教研工作,徐先生帮我确定了先秦城市考古的学位论文选题。从那时起,我就开始向严文明先生请益。199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,严文明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,俞伟超、张忠培、张长寿和徐苹芳先生为答辩委员。这一答辩团队,被学林誉为“黄金组合”。

此后的数年间,因出版经费迟迟未能落实,修改定稿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一直无法付梓。出于申请出版经费的需要,我曾多次请严文明和俞伟超二位先生为拙著写推荐意见,都得到了二位先生的慨然应允。恩师徐苹芳先生为了拙著的出版更是劳心费神。没有他们的教诲提携,我的处女作《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》是无法完成和问世的。这些,我都铭记于心,

清明时节,慎终追远。2024年,我们痛别叶嘉莹、严文明、饶芃子、谌容等文化名家。他们生前以不同方式守护文化根脉,滋养俗世心灵。斯人已逝,精神长青。值此清明,谨邀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祝晓风、考古学家许宏、中山大学教授林岗、文化学者段辉连以文字遥寄追思,愿文脉永续,风骨长存。

2024年去世的部分中国文化名家

戴逸(1926年9月10日-2024年1月24日),历史学家
谌容(1935年10月25日-2024年2月4日),作家
齐邦媛(1924年-2024年3月28日),作家
马瑞诤(1915年-2024年3月28日),作家
严文明(1932年10月-2024年4月14日),考古学家
魏明伦(1941年-2024年5月28日),剧作家
邵大箴(1934年-2024年7月25日),美术理论家
乐黛云(1931年1月31日-2024年7月27日),学者
付林(1946年1月17日-2024年10月7日),词曲作家
应云卫(1932年8月29日-2024年10月11日),诗人
聂华苓(1925年1月11日-2024年10月21日),作家
叶嘉莹(1924年7月2日-2024年11月24日),学者
饶芃子(1935年2月18日-2024年11月27日),学者
童祥苓(1935年3月5日-2024年12月2日),京剧表演艺术家
刘家昌(1943年4月13日-2024年12月2日),音乐人
琼瑶(1938年4月20日-2024年12月4日),作家
谢芳(1935年11月1日-2024年12月19日),电影表演艺术家



豆包AI

“潜心学孔孟,不沾官与银”

不敢或忘。

比至我接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,严文明先生又一直关注着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展。“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”发掘项目,入选“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,都是与严文明等先生作为评选委员的力荐分不开的。2014年10月,“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”在北京举行,年逾八旬的严文明先生又亲自到场,并作题为《课题意识先行开展多学科研究》的重要发言。在发言中,严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。他指出:“要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正确的把握,要有创造,要有发展。什么是方法?二里头遗址取得重大的发现和重大的研究成果,跟聚落考古的意识,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”是的,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聚落考古的重要奠基者和领路人,我们的业绩是在他及其他前辈的指导引领下取得的。

由徐苹芳、严文明二位先生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的考古学科“十二五”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,于2011年初正式推出了《考古学科“十二五”规划调研报告》。本人有幸与赵辉、陈星灿、朱岩石、杭侃、袁靖等师徒参与执笔。在和两位先生共同切磋成文的过程中,受益匪浅。当年5月22日,徐苹芳先生仙逝。这篇报告也成了此类调研报告的绝响。

回到严先生的诗集。《浚哲

诗稿》中,还有一首《二里头之谜》,作于2018年。先生对二里头的发现和争议娓娓道来,言及“人人说西亳,邹衡不苟”:“如今二里头,当为夏墟丘”。此说违众议,遂遭众人殿”。后来“众人遂改口,反认夏墟丘”。面对如此聚讼纷纭、莫衷一是的学术景观,严先生有自己的见解:“搔首再思考,猜谜竟不休:先夏后商说、非夏非商说、有夏无夏说、小康中兴说……中华第一都,不知何所属。二里头之谜,破谜未有期。若不见文字,难解此谜题。一定要破谜,难免书生气。都城大气象,岂是雾中谜?”(按:此诗原无标点,标点为引者所加)笔者的一贯表述则是: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,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。在這一问题的看法上,晚生与大先生之间,也有忘年的心心相印。

其实,读《浚哲诗稿》,能引发共鸣之处,所在多有。譬如严先生感怀道:“平生学考古,鉴古以观今。莫道书生小,常怀济世情!”(《自题小照》)又如,“潜心理学孔孟,不沾官与银”(页下自注:我曾自题自铭曰:一不做官,二不敛财,修身格物,贤哲情怀。)(《八十抒怀》)。至于“学海无涯生有期,师道不可须臾离。晚生不知黄昏至,朝朝暮暮自奋蹄!”(《七十感怀》),更是吾辈置身于座右,时时加以鞭策自省的。

□许宏

不如吾师者三

追随饶芃子老师读书三年,如今饶师归道山将近半年。去年夏季远赴外地支教前向饶师辞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,今则天人远隔。内心惆怅,略数不如吾师者三,以为怀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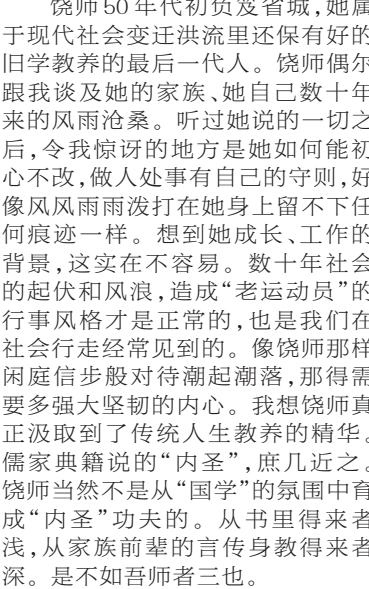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大学浸润多年,看到校园里总有一些教授比另一些教授更像教授。尽管不承认,而一眼望见,可断定必是教授无疑。饶老师就是这样的教授。饶师见我们学生,讲课也好,平时在她家闲聊也好,她总是妆容端庄整齐,衣着品位素朴淡雅,点饰恰到好处。而她的讲话,舒张有度,一板一眼,连吐词都是经过斟酌的,让听者如沐春风。在我的心目中,饶师是“女神”般的教授。记得有一回,她还是暨大副校长的时候,带我们几位在读博士去澳门参加学术会议。之前她特意叮嘱我:学术会议是庄重场合,穿衣服不可像平时那样随随便便,要弄得像个样子。这给我很深的印象,令我想到待人接物是中国传统教养的一篇大文章,而成长在“和尚打伞”年代的我,这方面是十分欠缺的。从校园读书出来,也忝列教师队伍,两相比较,高下立判。是不如吾师者一也。

攻读学位,需要好的学术环境和好的学术引路人,而营造好的学术环境和指引学生上路,则需要前瞻的眼光、组建团队的本领和争取得到足够的学术资源。饶师在这三方面都堪称楷模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西方发展多年的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传入中国,那时学术圈里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多。因为学者做事都有惯性,从原有赛道转入新赛道,需要眼光,需要勇气,需要放弃,其实并不容易。然而饶师的反应与众不同。她学中国古代文学出身,那年代自然也没有条件出国留学,但她能敏锐地觉察到中文学科里一条新赛道正在形成,而这就是学科拔萃而起形成自己特色的绝佳机会。她紧紧地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并且持续用力,做出成果,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作为新生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南派翘楚。饶师的做法是将原本烂熟于心的中国古典戏曲、现代话剧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研究,主编《中西戏剧比较教程》于1989年出版,并作为一门课程教授学生。1993年在有了多年深厚的积累后,联合时在深圳大学的胡经之教授申报博士点,一举成功,为学科发展开拓了新的生机。

申点成功固然是难得的开始,而饶师更可贵在于她有学科的忧患意识并且为学科发展持续努力。90年代初期,海外华文研究由于打开国门交流增多在学术圈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暨大这方面有天时、地利。饶师当然不会放过这机会,她的贡献是添

上人和的要素。这使得暨大海外华文研究大踏步走在全国高校的最前列,做出了最好的成绩。其实当时海外华文研究,在不少高校并不乏人,但由于不能形成合力,后继无人,高潮过后陷于凋零。暨大得饶师经营团队,形成阵地,便枝繁叶茂,持续发展。2002年中国海外华文研究会成立,饶师担任创会会长。她荣休之后,不忘学术,心系通过项目凝聚人心训练人才和栽培后学,主持修撰多卷本《海外华文文学史》。饶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,实在是一息尚存,鞠躬尽瘁。我略早上大学,在研究机关“野生”多年,回归校园之后,虽也顶过学术“带头人”的名号,但终究是“单打”的风格。是不如吾师者二也。

饶师50年代初初发省城,她属于现代社会变迁洪流里还保有好的旧学教养的最后一代人。饶师偶尔跟我谈及她的家族、她自己数十年来的风雨沧桑。听过她说的一切之后,令我惊讶的地方是她如何能初心不改,做人处事有自己的守则,好像风风雨雨泼打在她身上留不下任何痕迹一样。想到她成长、工作的背景,这实在不容易。数十年社会的起伏和风浪,造成“老运动员”的行事风格才是正常的,也是我们在社会行走经常见到的。像饶师那样闲庭信步般对待潮起潮落,那得需要多强大坚韧的内心。我想饶师真正汲取到了传统人生教养的精华。儒家典籍说的“内圣”,庶几近之。饶师当然不是从“国学”的圈圃中育成“内圣”功夫的。从书里得来者浅,从家族前辈的言传身教得来者深。是不如吾师者三也。



作者与饶芃子老师(右)合影

饶芃子
(1935年2月-2024年11月)

广东潮州人,著名文艺理论家,生前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副教授,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,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。1993年在中国首创“中西比较文艺学”方向,并率先倡导比较文学视域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和诗学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》《中西小说比较》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》《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》等。

没有作家架子的作家

□段辉连

1988年8月,我第一次见到作家谌容。但我和谐老师的小儿子,著名演员梁天认识还早一点,大约是在1987年年底。记得当时梁天与陈强、陈佩斯一起携新片《二子开店》来重庆北碚区举行见面会暨首映式,当时我在北碚区委宣传部工作,参与接待。那次帮助梁天找到他姥姥来参加北碚电影院的《二子开店》见面会,因此开始了与谌老师全家长达十几年的交往。

1988年8月,四川自贡举办恐龙灯展,谌老师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观摩团参观完灯展后绕道北碚,当时她母亲正住在北碚她妹妹谌德红家。8月26日上午,我接到重庆市委宣传部分文艺处电话,说一个著名作家要顺道到北碚探望亲人,叫我部代为接待,我正好分管文化工作,这个活就落在我身上。

谌老师是重庆巫山人,抗战期间,她随其父迁徙到重庆市北碚区,当时她父亲是国民党最高法院的官员。她这次来北碚,一是看望住在妹妹家的母亲,二是看看阔别了40来年的北碚区歇马场。抗战时,国民党最高法院就在歇马。

接到电话后不久,谌老师的车就到了。她脱口而出:“你是小段!我听梁天说过你!”一句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她马上就跟部领导提出:这几天就让小段陪伴。

她妹妹家在嘉陵江对岸的东阳镇,谌老师说不要车,就坐船过去看妈妈。我就提着她带来的行李包,蹚河滩,登跳板,上了过江轮渡。在跳板上,谌老师看着碧绿的嘉陵江水,以及锈迹斑斑的过江轮船,感慨地说道:“和我记忆中的北碚还是一个样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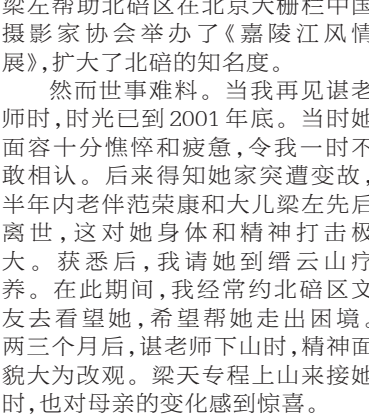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文学,尤喜小说和诗歌,也读过谌老师的《人到中年》,算她的粉丝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活动中,谌老师话较少,眼有神,温文尔雅,端庄美丽,一看就不是平常人,但一点都没有大作家的架子。

这是谌老师离开北碚30多年的第一次重访,只是待了短短几天,还专程看了歇马镇老家,就返回北京了。过了不久,谌老师又带大儿子梁左、二儿子梁天来北碚看母亲,他们一家都是名人,梁左是文化部研究

员、相声作家、编剧,梁天与葛优、谢园同称“三丑星”,都是名人。我爱人家在做火锅招待梁左、梁天兄弟俩,麻辣烫火锅下啤酒,两个北方小子连说爽爽爽。我还带他们游览了北碚的知名风景区缙云山、北温泉等地,让他们全家感受第二故乡的美景和纯朴乡情。后来,梁天与中央电视台导演来北碚指导拍摄春节展映节目《缙云春潮》,获得重庆市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展播一等奖;梁左帮助北碚区在北京大栅栏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《嘉陵江风情展》,扩大了北碚的知名度。

然而世事难料。当我再遇见谌老师时,时光已到2001年底。当时她面容十分憔悴和疲惫,令我一时不敢相认。后来得知她家突遭变故,半年内老伴范荣康和大儿梁左先后离世,这让她身体和精神打击极大。获悉后,我请她到缙云山疗养。在此期间,我经常约北碚区文友去看望她,希望帮她走出困境。两三个月后,谌老师下山时,精神面貌大为改观。梁天专程上山来接她时,也对母亲的变化感到惊喜。

这一别又是二十余年,直到去年惊闻谌老师病逝。



作者与谌容(右)合影

谌容
(1935年10月-2024年2月)

原名谌德容,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镇,祖籍重庆市巫山县。生前为中国作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及第六、七届名誉委员,作家、编剧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、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太子村的秘密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错、错、错!》等。